

近四十年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进展与转型

王 建民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很高兴来到爱知大学，也很高兴受到中国研究所和各位教授们的邀请，和大家一起研讨，也感谢今天来这里的听众们。因为很早之前我只学过一个学期的日语，是40年前，已经大部分忘掉了，所以我现在用汉语来讲。

我今天想讲的是40年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进展和转型的问题。40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冬至，今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40周年的日子。从40年前开始，中国大陆政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重大的转变就是开始强调全党的工作重点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次会议上检讨和纠正了此前自文革一直延续下来，甚至文革之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两个凡是，那个时候讲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把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面来，同时进行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

中国开始发生的一系列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一些已经停顿一些学科开始重新恢复，民族学、人类学就在此列。我有时把民族学放在前边，有时人类学放在前边，是因为不同的特定时代，看哪个具体的时间段更强调民族学还是强调人类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学科面临着新的机遇。

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学术变化，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学术转型。第一件事情就是学科重建。当时一些学术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

已经彻底地被解散了，有一些重要的民族学者、民族学研究的专家在文革中还受到了很严重的批判，也有一些人甚至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建了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学术队伍此前已经散了，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当时中国大陆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是停留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就需要“补课”。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都是需要“补课”。在重建过程中，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了一个全国民族研究的工作和规划会议，那个规划会议就明确提出来要重建民族学这样的学科、研究机构、还有专业系科。最早这项工作是由全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来负责的，也就是说最早在1979年4月一开始其实没有提具体的民族学，或者说民族学是归属在一个大的民族研究领域里。到了1980年就召开了中国大陆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第一次真正全国性的民族学学术讨论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曾经开过几次民族学的研讨会，但规模都是很有限的，不是全国性的会议。在这次讨论会上建立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就是现在的中国民族学学会。我也是这个学会的常务理事，还曾经担任过这个学会的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在座的周星教授当时也是副秘书长。中国大陆开始恢复了这样一个专业学术社团。有意思的是1981年5月接着又开了第一次全国的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是在福建厦门的厦门大学召开，由厦门大学的相关机构来主办。比较复杂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就开始显现出来。中国人类学学会本来想请中国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担任会长。费孝通先生说，已经有了一个

学会，就不要搞第二个了。问题是这个学会已经得到了批准，所以费孝通派了他的代表，而他本人并没有去参加。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不好选会长了，所以成立了一个 15 个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来负责这个学会的事情，当然学会的运作主要是由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负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更早一点的时间，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很有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从美国辞去教职，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在 1982 年建立了人类学系。当初其实和中国大陆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后来这个系对于中国大陆学科的重建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1981 年，中山大学复办了人类学。1983 年中央民族学院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大学，那个时候叫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现在我们叫做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当时就建了民族学系。1984 年，在厦门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其实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系和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是有点不一样的，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系包含了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两个专业，而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是考古学和人类学两个专业。

开始恢复学科时所能追寻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系是按照苏联的前苏联的模式，而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可能会更倾向于美国模式。这张照片是 1984 年林耀华先生等人去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中国民族学学会会议，中间的这位就是林耀华先生，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博士，有著名的《金翼》代表作。

重建时民族学人类学规模很小，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在重建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回归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学术研究脉络，其实和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学术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一种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民族研究模式。大量的此类出版物得到出版。在这时开始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至今依然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比如说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就是从甘肃青海一直到云南的过去认

为是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族群历史上由北向南迁徙的一个走廊，还有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概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概念也恰恰是发表 30 周年，是 1988 年提出的。当时就成为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来开展研究，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基本上就是以民族学与现代化为论题的。另外一种就是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前一种比如说六山六水调查，西南地区的一些山脉和河流的区域和民族的调查。而后一种可以以福建的惠东调查为代表，那时已经开始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合作。

在这样学术重建过程中也有一些学术引进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一些学术翻译工作。周星教授当时在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读硕士和博士，他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些翻译工作。当然这个时代翻译时不是特别强调民族学或者人类学这样的学科，而是以一种文化研究 (culture studies) 这样的一种范围来选择书目的。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学派开始慢慢地介绍进来，或者说重新去学习，但是到了 90 代以后，一批在国外学习的中青年学者陆续回国，和在中国大陆中青年学者对于以往一些学术的反思和批评结合起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诉求的变化，从民族学转向了人类学。特别是中国大陆中青年学者中过去做民族学的一部分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开始有了学术变化。在新的转换中，1995 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周星教授是那个时候的班主任。这个研讨班汇集了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并且邀请了国内外，当然包括台湾和香港的著名学者作为讲员，去宣传当代人类学的一些知识。这就实现知识更新。此后有了更多的学术介绍，包括中国本土的学者早期用英文写作的一些名著也都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同时也讨论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史，还有本土化等等话题。我们的学术有了一个更大的变化，开始和国际的人类学民族学界的逐渐的接近，包括现在很多青年学者到海外去做研究，现在申报课题如果没有最新的国

际学术的关税基本上大的课题是得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给我们提出来很多新的挑战。

当然，在挑战中也还是有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学科地位和学科概念的问题。我一开始讲民族学人类学，后边讲人类学民族学，其实这两个概念就是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在中国大陆是充满了争议，一直到现在这个争议依然在延续。人类学、民族学到底算一个什么学科。目前中国大陆人类学是归属于社会学的一级学科，它和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并列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但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学者希望人类学能够是一个单独的一级学科，也在不断地努力。但是因为做人类学的人实在太少了。十几年前我们参与东亚人类学研究时，在“日本殖民主义与东亚人类学”这样的一个课题讨论时，就讨论过的，其实整个东亚可能人类学都比较弱，就是比起美国、欧洲要弱，这是为什么呢，可能跟东亚地区更强调社会文化的一致性、忽略个体性和差异性有关系。

最近中国大陆也有了一些变化，最近的一次学术目录调整时，又在民族学一级学科里边增加了一个人类学二级学科，现在人类学这个二级学科分别在社会学和民族学里边，所以我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到底属于哪个学科了。用汉语说，懂汉语的可能明白，我们现在的人类学是“双重二奶”。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民族文化特殊性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关系的认识，特别是最近一系列中国大陆学术表述的倾向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前边提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最早的一种特别简单的理解叫做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中国大陆的民族研究确实有一种倾向，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太强调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而忽略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所以现在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地强调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与此同时，怎么样看待文化的多样性、怎么看

待民族和文化之间所谓差异依然是重要问题。也有一种区域研究的重新提出，而区域研究到底怎么做其实也是需要思考的。

第三个方面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应用的问题。一方面，应用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或者说研究领域，同时也有打破学科边界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问题是仅仅以应用为导向，对于理论的关注也许就变得不足，所以怎么样在应用研究中加强理论和方法上的研讨也是很重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学科建设中还存在一些学科自身的困难，可能是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学术体质造成的，不少研究机构都在谋求各自的发展路径，在各立山头、各立门户，都想当老大，都想当学术排头兵之类的。因为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要经常排队，你排在最前边你就有经费，排在后边你就没有经费，和我在日本感受到的这个学术发展的这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我就觉得做得很有特点，并不是说非要排第几，而是说能够拿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来。但是在中国大陆现在显然排在第几位，比有什么样的成果还重要。所以中国大陆学术研究也有些乱象，目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叫做某某人类学的这样一个学科的倡导，其实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不同研究领域而已。

然后，应该要有更多思考的就是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在学术转换过程中，中国一些学者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在考虑说怎么在通过各自的深入的细致的田野民族志的研究，同时通过不断扩大和深化学术交流，包括和国外学术同行，包括和欧美、日本学术界的交流，也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交流，希望能够有新的理论关怀。基于深入的、细致的田野民族志研究，能够提出新的一些学术见解。随着理论和方法论完善，也希望能够跟国际学术界有保持一种基本同步状态。从目前来

说，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相关院系并不算太多，一些研究机构还是在用很陈旧的框架做研究，特别是一些地方性院校。所以在中国大陆一些讲民族学的人的研究重点是做民族研究的，实际上就是做少数民族研究的，就是 ethnic minority studies 这样一种研究，基本上不会考虑太多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多样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知识生产上的原创性，能够对学术有更好的提升，增加学术对话的能力。在未来的学术发展过程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当然也会延续这样的历程，这样一种发展变化的历程。因为我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China)，所以在学术史的关怀中，希望我们的学科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样一种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能够被社会各界更多的接受。刚才在讨论关于历史的大众化的问题，现在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大陆能不能够大众化？我们希望大众化，希望更多的人来接受和了解我们这个学科。当然现在比以前好很多，我 80 年代时给人家说我是做人类学研究的，人家说你是不是寻找猴子、猩猩做研究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理解。现在再说我是做人类学的经常不用太多的解释，好在大家逐渐的了解，但是我们希望将来做的越来越好，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

好的，谢谢大家。